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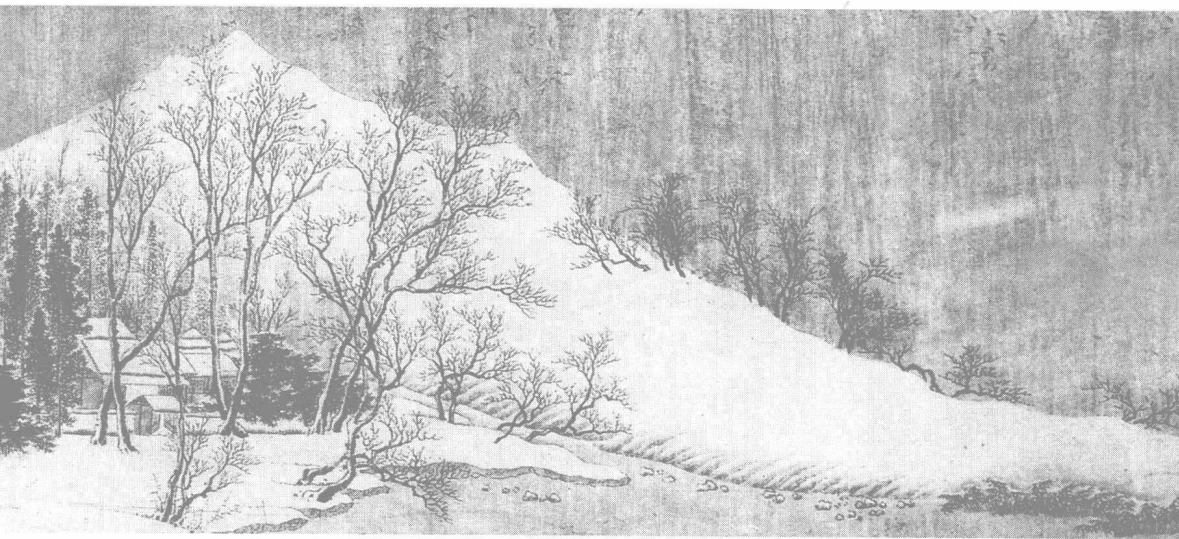


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研究

张 勇◎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 山 书 社

张 勇◎著
1378037



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研究

LIUZONGYUAN RUFODAO SANJIAOGUAN YANJIU

黄 山 书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研究/张勇著. —合肥:黄山书社,2009.12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ISBN 978-7-5461-0878-0

I. ①柳... II. ①张... III. ①柳宗元(773~819)—儒家—
哲学思想—研究②柳宗元(773~819)—佛教—哲学思想—研究
③柳宗元(773~819)—道家—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41.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9428 号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08JJD751078)

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基金项目(0802059C)

**由安徽师范大学出版基金、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资助出版**

出版发行:黄山书社

社 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00×1000 1/16

印 张:16.25

字 数:260 千

版 次: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2.00 元

序

洪修平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自汉代佛教传入以后,就一直在儒佛道三教的关系中演变和发展的。传统思想文化不仅内涵丰厚,而且形态多样,但儒学无疑是其主流和基础。儒学在先秦与诸子百家的争鸣中成长,在汉唐与佛、道的交融中发展,到宋代走向了成熟。最终形态的儒学,其实是以儒为基点融摄了佛、道等多种思想,是儒佛道三教的合一。从儒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唐代是它走向成熟的重要前夜,从三教关系来看,自南北朝三教既冲突又融合的复杂关系全面展开以来,到隋唐时也已进入了三教融合为主调、三教分别站在各自的立场力图融合吸收其他两家以发展自己的新阶段。柳宗元的三教观,既是三教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儒家思想中的体现,也是儒学走向成熟的重要前奏。

柳宗元是唐代重要的哲学家,也是唐代儒学的重要代表。汉唐儒学的发展,受到了来自于佛教的正反两方面的发展动力。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的发展,特别是大乘般若学和涅槃佛性论的先后兴盛,既开拓了中国佛教发展的新纪元,也为儒学在隋唐时期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理论动力,这种动力一方面来自于儒佛之争中儒学受到的反面刺激,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佛教思想资源的正面推动。相似的情况也来自于道教,但较之于外来的佛教,由于道教乃土生土长,在三教之争中道教又常引儒以为同道,因而道教与儒学的冲突小于佛儒之间。东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还往往从道教信仰的角度推

动了儒学的发展。^①到了唐代,儒学虽然恢复了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但儒学本身却并不十分发达。随着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对儒家的刺激,在儒家内部要求推进思想发展的压力与呼声大增,但直到中晚唐出现像韩愈、李翱、柳宗元、刘禹锡这样的思想家,才促成了唐代儒学的复兴。这种复兴一方面通过韩愈的道统论和性三品说以及李翱的复性论来呈现,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柳宗元与刘禹锡的天人之辨。如果说韩愈、李翱等人受到佛道心性论的影响而比较关注新理论的开拓与生长,那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则比较注意对旧观点的清洗,以求为新的世界观开辟道路,因此,柳、刘的理论兴趣主要集中在通过天人之学而唤起新的时代精神。在这个过程中,儒家学者对儒佛道三教的看法,对儒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勇博士的《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研究》对于理解儒学的发展、唐代的三教关系,乃至中国的学术思想发展,都显示出了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也表现了作者把握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独特的学术眼光。

从历史上看,隋末大儒王通就提出了“三教可一”的主张,表明其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开始正面回应佛、道的挑战并融会佛、道以求自新的努力。中唐以后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翱等人正是由此而进一步推进了复兴儒学的进程。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儒士虽然试图振兴儒学,但对什么是儒学尚缺乏确定的观念,故他们往往只是从某些侧面来强调儒学,例如柳宗元、刘禹锡关心的是儒家的人本理念,而韩愈、李翱等人则坚信儒家应占据中华文化的中心与主流地位。韩愈“道统论”的提出,表现出儒家学者实际上已经看到了儒家不同于佛道二教的根本之道,并将这种“道”确立为儒家价值观念的核心,这与儒家学者对儒学文化的自觉反思以及对佛道二教认识的深化是联系在一起的。

从思想理论的角度看,唐代儒家与佛、道的交涉,更多地表现为儒家对佛、道心性论的关注。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随着佛教中国化在隋唐时期的

^① 例如东晋著名道士葛洪在《抱朴子》中融合儒道思想建立了神仙道教的理论体系,特别是他以儒家伦理为尺度来改革早期道教的弊端,既为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也为儒学在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中持续发挥作用加固着基础。其后北朝寇谦之和南朝陆修静吸收儒家伦理对早期民间道教所进行的改造,也是既提升了南北天师道的社会地位,也进一步发挥了儒学的社会功能。南朝齐梁著名道士陶弘景更是吸收儒家思想对葛洪的金丹道教、上清派及陆修静的南天师道进行总结和改革,确立了道教对儒学的尊重与认同。

基本完成和佛教丰富内涵的充分展现,这个时期的儒者已经开始更全面更理智地看待佛教,注意到了讲求出世的佛教在出家修行等形式之下所蕴含的可以为儒家借鉴吸收的东西。柳宗元即是这方面的典型。

柳宗元曾对韩愈的激烈排佛明确表示不满,认为韩愈只看到了佛教的表面,只看到了佛教的形式,而没有看到佛教的表面形式下所包含的有价值的内容。他说:“退之(韩愈)所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①认为佛教并不仅仅是一块毫无价值的石头,而是包蕴着宝玉有待雕琢,这反映了柳宗元并不赞成佛教的形式,但对佛教的思想却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认同甚至赞赏的态度。他在《送琛上人南游序》中甚至说:“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经之大莫极乎涅槃。世之上士,将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经论,则悖矣。”并对琛上人的“观经得般若之义,读论悦三观之理,昼夜服习而身行之”表示赞赏。^②这表明,柳宗元对佛教的认识已逐渐深入到了佛学比较核心的内容。而他在《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中所表达的“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的看法以及通过对一位由学道而及学佛的道士的赞赏所表达的对佛、道“通而同之”的向往,则表明他虽然没有能完成吸收佛、道之学以重建儒学的任务,但他在儒家立场上观照儒佛道三教关系,期望统合儒佛道以复兴儒学的意愿则表现出了儒学发展的方向,并从一个侧面透露出了唐代儒学向宋明理学过渡的信息。

从以往学术界对柳宗元的研究情况来看,如张勇书稿的绪论中所说,海内外有关柳宗元研究的专著已经出现了多部,硕、博士学位论文也出现了多篇,发表的单篇论文更是多达近千篇,但到目前为止,以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为视角的专著尚未出现,相关的论文也较为少见,而这方面的研究,却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张勇的博士论文,围绕“柳宗元的儒佛道三教观”这一主题,首先梳理了柳宗元三教观形成的文化背景,接着分别探讨了柳宗元的儒教观、佛教观和道家道教观,然后对柳宗元的儒佛道三教融合观进行综合研究,最后探讨了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对宋代儒学以及对宋以后三教关系的影响等。非常可贵的是,书稿利用了许多作者本人从佛教《大藏经》中发掘出来的有关柳宗元的资料,从而能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柳宗元的三教观,

① 《送僧浩初序》,《柳宗元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674页。

② 《柳宗元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680页。

并提出了许多富有创新的见解。虽然有些观点和提法,例如认为柳宗元是唐代三教融合思潮中的儒家代表,他与佛教的宗密、道教的杜光庭并列为三,分别代表了各自立场上“三教融合”的方向,并根据柳宗元的思想特点和贡献对柳宗元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进行的重新评价等,都并非就是定论,都还可以做进一步的讨论,但这种学术探索精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也许正因为此,书稿中的有些章节,已经为《文学遗产》、《孔子研究》等学术刊物所采用,这也是对作者的一种鼓励吧。

张勇博士功底扎实,兼善文史,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又致力于哲学与宗教的学习和研究,认真刻苦,在获得博士学位以后,现仍在继续着他的学业。期待着他在已经取得的令人欣慰的成果基础上,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进步!

2009年国庆节于南京大学港龙园

绪 论

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研究,可以说是一个崭新的老话题。柳宗元是中国哲学史、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关于他的研究成果多如恒河之沙。海内外有关柳宗元研究的专著已经出现了多部,^①硕、博士学位论文也出现了多篇,^②尤其是单篇论文竟近千篇。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当然是个老话题。但到目前为止,以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为视角的专著尚未见到;尽管硕、博

① 中国大陆主要有:林纾的《韩柳文研究法》、黄云眉的《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孙昌武的《唐代古文运动通论》与《柳宗元评传》、何书置的《柳宗元研究》、蒋凡的《文章并峙壮乾坤——韩愈柳宗元研究》、陈雁谷的《柳宗元社会心理思想研究》、吴文治的《柳宗元评传》、刘光裕与杨慧文的《柳宗元新传》、翟满桂的《一代宗师柳宗元》、张铁夫的《柳宗元新论》、吴文治与谢汉强主编的《柳宗元大辞典》等。台湾地区主要有:方介的《韩柳新论》、袁本秀等人的《柳宗元之历史意识与史学贡献》、胡楚生的《韩柳文新探》,以及陈弱水的英文著作《柳宗元与唐代士人的变化》(*Liu Tsung-yu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等。

② 大陆博士学位论文有:卢宁的《韩愈、柳宗元文学综论》、龚玉兰的《贬谪时期的柳宗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有:张文安《柳宗元科学思想管窥》、乔丽《柳宗元交游考》、孔妮妮《柳宗元刘禹锡贬谪作品的对比研究》、于海平《柳宗元与中唐儒学》、王德春《柳宗元的贬谪生涯与他的山水文学》、蔡云飞《柳宗元与中唐赋坛》、赵彦霞《论柳宗元贬谪时期的思想及文学创作》、李丹《柳文与〈国语〉》、郑晓春《柳宗元山水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文化意蕴》、刘晖《韩柳古文运动的理论贡献及历史启示》、袁茹《柳宗元的学术研究与散文创作》等。其中,只有一篇硕士论文是有关柳宗元儒学思想的,其余皆是文学研究。台湾地区博士学位论文有:方介《韩柳比较研究——思想、文学主张与古文风格之析论》、林伯谦《韩柳文学与佛教关系》;硕士学位论文有:方介《柳宗元思想研究》、储砥中《韩柳文比较研究》、罗清能《柳宗元研究》、金容杓《柳宗元散文研究》、蔡振璋《柳宗元山水文学研究》、袁本秀《柳宗元寓言研究》、朴井圭《柳宗元的游记研究》、蓝百川《柳宗元及其诗研究》、郑色幸《柳宗元辞赋研究》、李淑如《韩柳传记文比较研究》、周秀华《柳宗元儒学思想研究》。大都是文学研究,有的虽然涉及佛教思想,仍是文学视角,哲学角度研究者只有一篇。

学位论文多达二十余篇,但大都是从文学角度切入,哲学角度较少,而儒佛道三教观综合研究更未出现;尽管单篇论文中也不乏从儒、佛、道某一方面为视角者,但以柳宗元视域中的三教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也较少见到。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所论又是一个新话题。

有人对整个20世纪的“柳学”研究成果做过统计分析:

我们认为20世纪柳宗元研究的重点是关乎柳氏诗、文、赋创作的文学研究以及思想研究;而就这四大分野来看,如果除去“文革”期间因受政治影响而学术价值不高的一批论著不计,则其成果数量分布依次为:诗歌111项,散文279项,辞赋小说11项(辞赋9项,小说2项),思想研究198项。^①

前三类都属“文学研究”,共计401项,是“思想研究”的两倍多。作者又对“思想研究”进一步分析:“哲学思想约90项,社会政治思想约47项、文学思想约47项,美学思想约12项。”这也就是说,在20世纪出现的600项研究成果中,关于哲学思想研究的只有90项,所占比例远小于文学研究。

柳宗元哲学思想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界围绕其思想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展开过激烈的论争。^②“文革”期间,柳宗元被戴上“法家”桂冠,成为炙手可热的“学习榜样”。“文革”结束后,再一次掀起关于柳宗元世界观本质的讨论热潮。有学者重申柳宗元世界观的“唯心主义”本质,而大多数学者则以“自然元气论”、

① 洪迎华、尚永亮:《柳宗元研究百年回顾》,《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

② 以侯外庐为代表的一派学者极力主张柳宗元是“唯物主义”者,大力赞扬其思想的“战斗性格”,而以范文澜为代表的另一派学者则认为,柳宗元“中佛毒很深”,是“半截唯物,半截唯心”。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及其论文《柳宗元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哲学研究》,1964年第6期;赵纪彬:《刘禹锡和柳宗元无神论思想研究》,《哲学研究》,1957年第5期;吴文治:《柳宗元无神论思想初探》,《新建设》,1958年第3期;范文澜:《中国通史》第3编第2册;陈扬炯:《柳宗元是很彻底的无神论者吗?》,《文汇报》,1964年1月21日等。

“反天命论”及“并非真心信仰佛教”为依据进行反驳。^① 1983年召开的柳宗元哲学思想研讨会上,学者们围绕这一问题继续讨论,会后出现了大量论文,集中讨论柳宗元与佛教的关系。^② 其中,赖永海先生的观点尤其值得注意,他将“佛教”与“佛学”两个概念区别开来,认为柳宗元嗜好佛理,与其“唯物主义”世界观并不矛盾,这一思路对后来柳宗元佛教观的研究有较大启示意义。此后,这方面的探讨仍在继续,并逐渐摆脱强烈的意识形态的束缚。^③ “统合儒释”是柳宗元佛教观中十分突出的内容,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研究论文不绝如缕。^④

柳宗元被摘下“法家”的“桂冠”后,学界开始探讨其儒家思想,重新确立其儒家归属。经过三十年的努力,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如乔长路的《柳宗元的儒家风范》,彭建、邢凤麟的《柳宗元是儒学的伟大改革者》,尤骥的《柳宗元在儒学复兴运动中的地位》,刘光裕的《柳宗元与儒学革新》,寇养厚

① 参见丁宝兰《柳宗元世界观的实质问题》,《哲学研究》,1979年第2期;潘富恩、施昌东:《关于柳宗元世界观的实质问题——与丁宝兰同志商榷》,《陕西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柯兆利:《柳宗元世界观辩——与丁宝兰先生商榷》,《哲学研究》,1980年第3期;刘心长:《论柳宗元的哲学思想的主要倾向——兼与丁宝兰同志商榷》,《晋阳学刊》,1981年第5期等。

② 主要有,唐志敬:《柳宗元“好佛”的原因及其世界观的实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岑贤安:《柳宗元与佛教的关系》,《学术论坛》,1983年第4期;赖永海:《柳宗元与佛教》,《哲学研究》,1984年第3期;谢汉强:《柳宗元与佛教》,《中国哲学史研究》,1983年第3期;李传明:《柳宗元与佛教》,《文史哲》,1984年第6期。

③ 孙以楷:《柳宗元与佛教及佛学的关系》,《安徽师大学报》,1986年第2期;张武:《论柳宗元“好佛”的两重性特征及其评价问题》,《广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孙昌武:《论柳宗元的禅思想》,《文学遗产》,1991年第2期;杜寒风:《柳宗元与佛教禅宗的问题》,《社会科学家》,1994年第1期;陈晓芬:《柳宗元崇佛的主体意识》,《中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4期。

④ 孙昌武:《试论柳宗元的“统合儒释”思想》,《中国哲学史研究集刊》,1980年第1辑;唐志敬:《柳宗元“统合儒释”论初探》,《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龙震球:《我对柳宗元“统合儒释”的肤浅看法》,《零陵师专学报》,1986年第2期;王一民:《论柳宗元的“统合儒释”》,《中国哲学史研究》,1988年第3期;李锦全:《柳宗元与“统合儒释”思潮》,《晋阳学刊》,1990年第6期;郎宝如:《柳宗元“统合儒释”思想评价》,《内蒙古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牟钟鉴:《从儒佛关系看韩愈、柳宗元与李翱》,《圆光佛学学报》,1993年;杜寒风:《柳宗元“统合儒释”思想新论——兼及对冯友兰、孙昌武、郭绍林等先生观点的质疑》,《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2期。

《中唐新〈春秋〉学对柳宗元与永贞革新集团的影响》等。^① 柳宗元的道家、道教观是“柳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少,^②也缺少理论深度。

港台海外有关柳宗元儒佛道思想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主要有:林金龙的《略论柳宗元与佛教的关系》、方介的《韩、柳对儒、释、道的取舍》、朱国能的《柳宗元诗禅机理趣事探讨》、陈弱水的《柳宗元与中唐儒家复兴》、蔡惠明《柳宗元的佛学思想》、王煜《柳宗元、刘禹锡显扬荀学而未佞佛论》等等。^③ 另外,日本也出现了一些“柳学”研究成果,但绝大多数是有关文学研究的,哲学、宗教思想研究较少,主要有户崎哲彦的《柳宗元的明道文学——与陆淳的春秋学之关系》、《柳宗元和中唐的佛教》等。^④

有必要对上述研究成果作一总结与反思。就中国大陆来看,柳宗元与佛教关系方面,上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受强烈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讨论主要集中在柳宗元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是否真的信仰佛教等问题。这些讨论有两个潜在的前提:“唯物主义”是进步的,“唯心主义”是落后的;信仰佛教是消极的,批判佛教是积极的。90年代以后的讨论,逐渐摆脱这种强烈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进入学术视域的探讨。我认为,对于柳宗元佛教观的研究,一定要跳出“信”与“不信”之争,把佛教作为一种文化学术来看待,并进入中唐儒佛道三教争辩与融合

① 杨达荣:《柳宗元与宋明理学》,《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10期;乔长路:《柳宗元的儒家风范》,《孔子研究》,1994年第1期;彭建、邢凤麟:《柳宗元是儒学的伟大改革者》,《中国哲学史》,1994年第6期;尤骥:《柳宗元在儒学复兴运动中的地位》,《孔子研究》,1994年第2期;刘光裕:《柳宗元与儒学革新》,《孔子研究》,1994年第3期;寇养厚:《中唐新〈春秋〉学对柳宗元与永贞革新集团的影响》,《东岳论丛》,2000年第1期。

② 黄蝶红:《柳宗元思想中的道家成分》(上、下),《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1995年第1期;张靖龙、周招满:《论柳宗元的黄老思想》,《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张铁夫:《柳宗元对道家与道教的态度》,《零陵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

③ 林金龙:《略论柳宗元与佛教的关系》,《孔孟月刊》,1996年4月;方介:《韩、柳对儒、释、道的取舍》,《中正大学中文学术年刊》,1997年12月;陈弱水:《柳宗元与中唐儒家复兴》,《新史学》,1994年3月;朱国能:《柳宗元诗禅机理趣事探讨》,《唐代文学研究》(第七辑),1998年10月;蔡惠明:《柳宗元的佛学思想》,《香港佛教》,1984年8月;王煜:《柳宗元、刘禹锡显扬荀学而未佞佛论》,《新亚学术集刊》,1982年第3期。

④ 户崎哲彦:《柳宗元的明道文学——与陆淳的春秋学之关系》,《中国文学报》(36),1985年;《柳宗元和中唐的佛教》,《中国文学报》(38),1987年。

的语境之中,这是我们今天急需做的。另外,从《柳集》中大量有关佛教的资料看,柳宗元对唐代大乘佛教中的禅宗、天台宗、净土宗、律宗等宗派持有不同的态度,而过去学界大都是从整体上论述其佛教观,较少深入到他对具体宗派的理解与评价,而这恰是更为重要的。

柳宗元与儒学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其儒家身份已基本得以确立。这些成果多集中在柳宗元的“民本思想”,柳宗元在儒学复兴运动中的地位,及其对宋明理学的影响等方面。从目前来看,此方面的研究还有扩展的空间与必要。例如,柳宗元的宇宙论与心性论是如何立足儒家立场而融合三教资源的?此问题必须置于中唐三教关系的大背景之中才能得以解决。过去学界倾向于把宋明理学当作中唐儒学复兴运动的唯一“正果”,立足于此来评价柳宗元对儒学复兴所做的贡献,而忽略了柳宗元对宋代儒学另一重要分支——事功儒学的影响,这就影响了对柳宗元儒学观的全面评价。柳宗元与道家、道教关系方面研究成果很少,这直接制约着对其三教观的全面研究。

柳宗元生活的中唐时期,儒佛道三教虽然鼎足而立,但融合之势已如滚滚洪流,势不可挡。佛道两教在大力加强自身理论建设的同时,又站在各自立场之上,明确提出“三教融合”主张。佛教方面,中唐的宗密采取“本末会通”的方式,以佛教为中心融摄儒道,达到了汉末以来以佛教为中心的三教融合的最高峰。道教方面,晚唐道士杜光庭,既圆融道教各派教理,又积极吸取儒、佛二教的精华,完成了其以“道”为基点的“三教融合”体系,堪称唐代“三教融合”思潮中道教的代表。在这股强劲的融合思潮中,儒家学者中,既提倡“三教融合”又不失儒家立场的代表人物应该是谁呢?这是以往学界没有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柳宗元的“三教融合”主张及理论建构缺少深入的挖掘。

前贤时俊的丰硕研究成果,为本课题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留下的发展空间又为本课题提供了继续研究的机遇。本书试图在以下两方面有所突破:

其一,在佛教《大藏经》中发现大量有关柳宗元的材料。《隆兴佛教编年通论》、《释门正统》、《佛祖统纪》、《乐邦文类》、《佛祖历代通载》、《居士传》等佛教史传著作,以及契嵩、宗杲、元贤等高僧的著作中,有大量关于柳宗元的记载与评价。通过这些材料,我们可以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柳宗元的三教观。这些材料是以往学界很少使用的。

其二,提出一些新视角与新观点。如:1. 柳宗元是唐代三教融合思潮中的儒家代表,他与佛教的宗密、道教的杜光庭并列为三,分别代表了各自立场之上“三教融合”的方向;2.《大鉴碑》有意避开“法衣”、“顿悟”这两个敏感字眼,体现了柳宗元统合禅宗南北、统合禅教,进而统合儒释的“和谐”佛教观;3.《东海若》对净土信仰及念佛、持戒等修行实践提倡的背后,隐含着柳宗元火热的现世关怀与冷静的理性思考;4. 柳宗元标举“孔子”为中唐时代精神的方向,为唐王朝指明重建“大一统”社会秩序的政治方向和三教融合的文化方向;5. 通过柳宗元对道教五部“真经”的理解与评价,分析其道教观;6. 柳宗元宇宙论的本体化趋势,导源于三教之间的争辩与融合;7. 梳理出柳宗元三教关系张力下的心性论;8. 分析了释氏眼中的柳宗元;9. 重估柳宗元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等等之类的观点还有不少,这些观点可能会有偏颇之处,论证也可能还欠周密,但皆代表笔者目前之认识,以期方家指教。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力争把每个细节方面的研究都置中唐三教关系的大背景之下,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各章节根据内容的不同需要而采用不同的方法,如以“负问题”法研究柳宗元的禅学观,以诠释学的方法研究柳宗元的儒学观,但有三条贯穿始终的原则。第一,义理与考据相结合。本书的宗旨和重点是对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进行义理上的分析,为了充分保证所用材料的可信性与准确性,不少章节都是先进行材料的考证,再在考证的基础上进行义理分析。第二,以哲学为本,同时摆脱学科局限,将哲学、史学、文学熔铸在文化意识的范型之中,在广阔的三教关系背景之下,进行文本考察,包括属于文学范畴的散文、诗歌等。第三,史论结合。在每个问题展开论述之前,一般都先进行学术史的回顾,再提出自己的观点。

本书各章主要内容与方法大致如下:

第一章“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形成的文化背景”,分别列举了初唐以来国家的三教政策、三教各自的发展状况,及三教鼎立的整体文化格局,这是柳宗元三教观形成的文化背景。

第二章“柳宗元的儒教观”,采用诠释学方法,先揭示柳宗元对儒“道”的诠释原则,再揭示其对儒“道”内涵的诠释,最后分析柳宗元对儒家“道统”的诠释。

第三章“柳宗元的佛教观”,分析柳宗元对禅宗、天台宗、净土宗、律宗四大宗派的理解与评价,每节都是先进行材料考证,再进行义理分析。

第四章“柳宗元的道教观”，采取义理与考据相结合的方法，揭示了柳宗元对道教五部“真经”的考证与评价，及其对道家、道教理论的批评、改造与吸收。

第五章“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融合观”，先采取归纳法揭示柳宗元“三教融合”的总原则、总方向与纽结点，再通过背景分析法，分析柳宗元在三教关系张力下宇宙论与心性论的独特内容，最后用对比法，凸显柳宗元在唐代三教融合思潮中的独特地位。

第六章“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的影响”，用列举比较法先揭示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对宋代儒学的影响，再揭示其对宋以后三教关系的影响。

目 录

序	洪修平 1
绪论	1
第一章 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形成的文化背景	1
[1] 第一节 佛道二教的迅猛发展与儒学的理论危机	
[10] 第二节 三教鼎立的文化格局	
[14] 第三节 时代的选择:柳宗元三教观的形成	
第二章 柳宗元的儒教观	18
[19] 第一节 托迹儒门	
[21] 第二节 柳宗元的儒“道”诠释原则	
[31] 第三节 柳宗元对儒“道”内涵的诠释	
[49] 第四节 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家“道统论”	
[56] 第五节 柳宗元儒教观的时代意义	
第三章 柳宗元的佛教观	59
[60] 第一节 柳宗元的禅学观	
[82] 第二节 柳宗元的天台观	
[91] 第三节 柳宗元的净土观	
[104] 第四节 柳宗元的律学观	
[112] 第五节 柳宗元佛教观总论	
第四章 柳宗元的道教观	118
[119] 第一节 柳宗元对道教“真经”的理解与评价	
[129] 第二节 柳宗元对道家、道教理论的吸收与发展	
[142] 第三节 柳宗元对道教方术的批判	

第五章 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融合观	148
[148] 第一节 初唐以来的“三教融合”思潮	
[154] 第二节 三教归孔	
[166] 第三节 三教关系张力下的宇宙论	
[182] 第四节 三教融合视域中的心性论	
第六章 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的影响	198
[198] 第一节 柳宗元三教观对宋代儒学的影响	
[211] 第二节 柳宗元三教观对后世三教关系的影响	
结论	219
主要参考文献	228
后记	240

第一章 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形成的文化背景

初唐以来,尽管每位帝王对待儒佛道三教的具体态度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采取了三教并行的文化政策,他们一方面提倡以儒学为治国之本,另一方面又提倡以道教、佛教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补充。君主的三教并举政策及“三教论衡”活动,促进了三教鼎立文化格局的形成。以此为契机,佛道二教迅猛发展起来,不但信徒数量猛增,寺院、宫观遍布名山都邑,而且理论体系也发展成熟,对文人士大夫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佛道二教的迅猛发展,不但使儒学失去了其昔日的独尊地位,而且在理论上也相形见绌。这种局面引起了柳宗元等有强烈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之儒士的深沉思索。

第一节 佛道二教的迅猛发展与儒学的理论危机

初唐以来,佛道二教在帝王的支持之下,发展势头迅猛,其理论架构已经完成,在体系的完备及哲学思辨上都遥遥领先于儒家。儒家除了拥有往圣先贤留下的经典之外,还有一张政治“王牌”,大多数儒家学者,有的忙于做官,有的忙于数典,根本无暇于哲学理论的思考,中唐以前的儒学基本陷于章句之学中难以自拔。

一、佛道二教的发展状况

(一)佛教的发展状况

唐代,佛教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达到了鼎盛时期。在皇权的优容下,寺院经济极度发达,这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佛教在学术方面也得到迅速发展,主要表现为佛典的大量翻译、整理与注疏,佛教义理的哲学化,尤其是八大宗派的形成。佛教不但以其“无上甚深微妙法”深深地吸收着平民百姓,而且以其缜密的理论体系和高度的思辨水平深深地吸引着文人士大夫们。